

史

記

纂

證

壹

本紀

韩兆琦
编著

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国家「十五」出版规划重点图书

本书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

本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

史记笺证

韩兆琦
编著

江西出版集团·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笺证/韩兆琦编著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

2004.12 (2009.3 修订)

ISBN 978 - 7 - 210 - 03132 - 1

I. 史... II. 韩... III. ①中国 - 古代史 - 纪传体

②史记 - 注释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7058 号

封面题签:郭预衡

编辑组长、审定:林学勤

责任编辑:陈世象 喻致评

装帧设计:揭同元

史记笺证

韩兆琦 编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05.875

字数:5500 千 印数:3001 - 5000 册

ISBN 978 - 7 - 210 - 03132 - 1 定价:680.00 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邮政编码:330006 传真:6898827 电话:6898893(发行部)

E - mail:jxpph@163.net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《史记笺证》再版说明

《史记笺证》自2005年春问世以来，深得《史记》爱好诸君的喜爱，并获得了“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”二等奖。到2007年夏，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。在此期间，我们对第一版《史记笺证》进行了检查修改，对印刷过程中出现的乱码、讹误，进行了改正；对某些注释与按语进行了修订补充；对“年表”与插图中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调整，总共改动了四百多处，应该说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。在此《史记笺证》再版之际，我们特别向给这次修改补充提供了意见与建议的李旭、王军、冯其庸、梁建邦、龙德寿等师友表示深深的感谢；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更多的《史记》爱好诸君的指正。

本书的总体设计与主要部分由韩兆琦完成。

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：

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牛鸿恩编注了《三代世表》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《六国年表》，并协助修改过战国人物的篇目二十三篇；

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杜升云、宁小玉编注了《律书》《历书》《天官书》；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安东编注了《礼书》《乐书》；

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陈曦编注了《夏本纪》《周本纪》《齐世家》《鲁世家》《宋世家》《陈杞世家》《晋世家》《司马相如列传》《龟策列传》；

中华书局周旻编注了《燕世家》《管蔡世家》《卫世家》《楚世家》《郑世家》；

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刘晓林编注了《扁鹊仓公列传》。

全书由韩兆琦统一修改定稿。

序

安平秋

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。他的历史巨著《史记》也完成于这一时期。至汉宣帝时，他的外孙杨惲将《史记》公之于世，使《史记》得以流传，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。两千余年来，为《史记》全书作注释的人，据粗略统计不下数十家。但随《史记》一书得以流传至今的、为治《史记》者所器重的却是“三家注”，即刘宋时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、唐代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和唐代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。而“三家注”中最晚的一家张守节是生活在唐玄宗时期，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左右了。在今天，过去为《史记》所作的各家注释，已远不能适合今人的阅读、使用和研治《史记》的需要了。在上个世纪（20世纪），一些名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，为《史记》作新的注释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其中主要是所据资料的局限，且时间又已经过了七十年，故而直到今天——21世纪初，我们仍然期待着一部坚实的、极具学术功力的、适合今人需要的《史记》注释新作出现。

令人欣喜的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《史记笺证》，这是由韩兆琦教授编著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《史记》注释新作。全书550万字，而《史记》一书的原文为50余万字，新作的注释是原文的10倍，可见注释之详尽、收集资料之宏富。从我所见到的部分样稿中，看出《史记笺证》一书有四大长处：一是《史记笺证》对

当前通行本(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)《史记》原文的文字讹误和标点失当做了校正。据统计,全书多达200余处。二是在有依据地尊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,充分吸收了近百年来新的研究成果。对传统解释中的不当之处做出辨正,对过去解释模糊不清之处提出了有见地的新说。三是注重运用近一百余年在中国新发现、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为《史记》做注释,以考订、验证《史记》原文所叙述的史实。即将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治学“二重证据法”运用到了《史记》注释中去。四是收集、引证了古今人物对《史记》和《史记》中人、事的评论,使注释更坚实、更鲜活。具有以上四大长处的这部《史记笺证》,体现出《史记》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既传统又崭新的境界,那就是既具厚重的学术功力,又眼界开阔、识见精到。我们期待《史记笺证》一书成为中国《史记》研究进入新境界的里程碑。

我与韩兆琦教授相识多年。他是当今海内外研究《史记》的名家、大家。我从他的论著中,从与他的多次交往中,乃至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请他来北大主持我的两名研究生以《史记》为题的毕业论文答辩中,感受到他治学的谨严、思路的敏捷和识见的精到。这次,从他编著的《史记笺证》中,更看到他对当断之处敢于下断语、对无把握之处甘于阙疑的魄力和求实精神。这更增强了我对他的敬重。

韩兆琦教授年长于我。他命我为《史记笺证》作序,我虽知接受下来有些不知深浅,但面对他的抬爱,也只好应命。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林学勤社长的督促之下,成此一篇,以表达我对韩兆琦教授的《史记笺证》的真诚的认识。

安平秋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、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、中国《史记》研究会会长。

序

张大可

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。他的《史记》是公认的历史名著。作为史学名著,《史记》体大思精,内容丰富,包罗万有,贯通古今。它上起黄帝,下迄太初,会综古今典籍,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,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。作为文学名著,《史记》以人物为中心,记述历史,所记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,语言雄深峻洁,有很强的文学性,被唐宋八大家奉为古代的散文典范。伴随时代的前进与人们认识的深入,《史记》的文学性在近现代大放光彩,《史记》中的人物传记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。《史记》是如此的一部文化瑰宝,所以自问世以来历经两千余年,不仅一直拥有广大读者,而且日益走向普及,《史记》生命之树常青。但是由于古今语言的巨大差异,以及人们对古代典章制度、风物人情,还有地理沿革变迁等等的陌生,真正读懂《史记》,品评其中滋味,十分困难。于是历代以来有众多的学者研究和注解《史记》,积聚起来丰硕的成果。粗略统计,迄今累计有论文四千余篇,论著三百余部,字数一亿两千多万字。对于初学者来说,未免有浩如烟海之叹。《史记》研究的过半成果是解读《史记》,标志性的名著首推唐代形成的“三家注”,近代则有东邻日本学者完成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近年来,《史记》大量刊行,各种校本、注本、选本、译本,有如雨后春笋,笔者所见全本

《史记》新注就有近十种。但杰出著作不多,就新注来说,还难与“三家注”和“会注考证”比肩。值得欣喜的是,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推出的五百余万言的《史记笺证》是值得关注的一部大部头的《史记》新注本。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是当代《史记》研究界的一件大事。

韩兆琦教授是当今一位卓有成就的古典传记文学的研究专家,知名学者,他对《史记》的研究情有独钟,花费了他过半的精力,成绩可观。韩兆琦教授对《史记》文章的赏析、文学性的阐释,蜚声学界,出版了《史记选注集说》《史记评议赏析》《史记通论》《史记题评》等多项成果。其中“集评”是韩兆琦教授的首创,荟萃历代评点《史记》的精言,沙里淘金,付出了巨大的劳动。在此基础上,韩兆琦教授厚积薄发,把他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集中凝聚在《史记笺证》中,是值得敬慕的。

我与韩兆琦先生多年相知,共同切磋。我对《史记》侧重史学研究,韩先生侧重文学研究,各展所长。韩先生有所心得,毫无保留相告,使我受益匪浅。而注疏《史记》需要全面的知识。近年来,韩先生关注考古与历史调查,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同行学者和各学科专家请教。他加强了对《史记》思想性和史学的研究,对“笺证”蓄积力量,对《史记》十表尤有心得。韩先生的这些努力,都熔铸在《史记笺证》中。韩先生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敬仰。《史记笺证》杀青后,韩先生送来部分清样,向我索序。我诚惶诚恐,许久不能下笔,生怕笔力浅薄,埋没了这部皇皇巨著的精华。但老友诚意,敢不从命。我只能勉为其难,说一点浅见,向读者推荐,以期抛砖引玉。

司马迁崇高的人格,表现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韩先生研究《史记》,学习司马迁,心灵相通,也表现为不凡的创新精神。《史记笺证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着多方面的创新,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就大的方面来说,主要有四个方面,分述如次。

其一,《史记笺证》运用本证、旁证与理校等多种方法,对当前通行本《史记》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,校改了二百多处。注解《史记》的首要任务是竭尽所能恢复《史记》原貌。《史记笺证》对此花了大力气。该书凡例二十一条,前十条凡例集中对《史记》原著文字的校正处理,占了凡例的半数,由此可见《史记笺证》注释的重心所在。韩先生花大力气校正《史记》原文,凡校正之处皆出注说明与论证,有的更改,有的只是提出问题,区别对待,态度严谨,这无疑是在注解古籍的正确态度,也是对传统校勘学的弘扬。所谓通行本《史记》,当代所指即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史记》,韩先生据以作底本,这是聪明而又正确的选择。因为中华本《史记》,是几代人的校勘总成果,是众多前辈学者的智慧结晶,对此做出校正难度是非常大的,也是要勇气的。为了求真,韩先生知难而上,做出了成绩,特别是对一些大家习见而默认为错误的错误做了校正,或提出新解,实为难得。例如《孔子世家》正文中有“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,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”。说“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”是对的;说“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”,并说“孔子冢大一顷”,就显然不对了。《史记笺证》引阎若璩的考证,以《孔子世家》的赞文作“以时习礼其家”为证据,更正后两个“冢”字是“家”字之误,是为本证。现存事实的比较是为理证,《史记笺证》作如下按语:“孔子冢在今山东曲阜市城北的孔林中,是一个不大的土丘,别说一顷,连一亩也没有;孔子家的旧址在今曲阜市的孔府内,孔子死后越来越阔气,现存孔府共占地至二百四十亩;孔子活着的时候到处碰壁,不可能有这样大,但比那个土丘大一些还是应该的。”这个按语并不是以简单的事实对比就做出推理论证,它注意了历史的发展,逻辑严密。同时行文诙谐风趣,增强了可读性。韩先生讲话、行文潇洒飘逸,很有个性。这一风格带入《史记笺证》,很有特色。

其二,引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方法于《史记笺证》,博采非文

献资料注解《史记》，贡献突出。韩先生不仅吸收考古资料，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《史记》文本叙述的史实；而且访求、采录地面遗留的各种古代遗迹，诸如城垣、关塞、楼台、陵墓、碑碣等可与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相互印证者录入注释中，既资博览，以广异闻，又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，还有的纠正了文本叙事的偏差。例如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，这一重大事件，文献记载见于《周书》《尚书》《韩非子》等多种典籍，而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铜器“利簋”，这是一件纪念武王克殷大臣利受赐的礼器，铭文详细地记述了武王灭商的事实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。“利簋”的出土以实物证实了武王灭商的历史事件，使之更加明晰而生动。又如山西高平县永禄乡多个古代尸骨坑的发现，可证《白起王翦列传》中秦赵长平大战赵军覆灭的地方以及白起坑杀赵卒的史实。至于周文王被囚于囿里的遗址，秦始皇刻石颂功的刻石遗存，秦修直道遗址，田单复齐所据莒城、即墨城的遗址等等，以资证史，极为亲切，韩先生广泛采择，系统地引入《史记笺证》，很有胆识。

其三，引证宏博，多方取资，大大丰富了注释的内容，开拓与发展了现代注疏学。《史记笺证》的引证是开放式的，广泛采择，不设界囿，成为一大特色。广泛采择，仍有重点，着重三个方面：一是采择、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正讹旧注，提出新说；二是采择、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对《史记》有关史事、人物的评论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内涵，提高阅读能力；三是采择、引证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，用以加深读者对《史记》文学性的理解，并增强阅读乐趣。试各举一例以说明。《陈丞相世家》《匈奴列传》中提到的匈奴“阏氏”，三家注《集解》引苏林说“阏氏”如“汉皇后”。释匈奴“阏氏”为“皇后”，千余年来没有人提出异议，遂成定论。而《史记笺证》引用林干《匈奴史》研究的成果，认定匈奴“阏氏”乃是对匈奴单于多妻的通称，如汉室的“嫔妃”，而不是“统率后宫，母仪天下”的皇后，从而纠正了旧注的误说。楚汉相

争刘胜项败，弱者战胜了强者。《史记笺证》引用了毛泽东以及军事史专家的评论加以解说，指出：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，施政深得人心，善于用人，把握了战争全局，指挥艺术得当；而项羽反是，不是政治家，贵族出身，不了解社会，不善于用人，不懂战争艺术，终于导致优劣易势，成败异变，成为悲剧英雄。引用大政治家、军事家的评论解说历史大事件，无疑具有权威性。《史记笺证》引文学家的评论解说《史记》中的精妙笔法，更为传神。例如《项羽本纪》载霸王别姬的一幕：“于是项王乃悲歌愴慨，自为诗曰：‘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’歌数阕，美人和之。”这是何等的一个悲壮场面，《史记笺证》是怎样解说的呢？不妨全文引述如下：

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四句——朱熹曰：“慷慨激烈，有千载不平之余愤。”吴见思曰：“‘可奈何’、‘奈若何’，若无意义，乃一腔怒愤，万种低回，地厚天高，托身无所，写英雄失路之悲，至此极矣。”钱锺书引周亮工曰：“垓下是何等时？虞姬死而子弟散，匹马逃亡，身迷大泽，亦何暇更作歌诗？即有作，亦谁闻之，而谁记之欤？吾谓此数语者，无论事之有无，应是太史公‘笔补造化’，代为传神。”

歌数阕——一连唱了几遍。阕：段、遍。美人和之——《正义》引《楚汉春秋》所载虞姬和歌云：“汉军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”殆出于后人依托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虞姬墓在濠川定远县东六十里。”按：今安徽灵璧县城东十五华里之宿泗公路旁有虞姬墓，墓前有一石碑，横额刻“巾帼千秋”。两旁对联为：“虞兮奈何，自古红颜多薄命；姬耶安在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”

史公笔力千钧，寥寥数语刻画了一盖世英雄末路的悲壮场面，

《史记笺证》引证他人之语层层解说，活脱脱再现了这一场面，使历史人物历历在目，可歌可泣；而且有分析，有辨正，引人深思。《史记笺证》编著者韩先生自己没有说话，而胸中意境全盘托出，借他人之语写尽胸中之意，寓论断于叙事之中，是史公笔法，韩先生运用得心应手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没有高超的文学修养和抉择组织能力是做不到的。韩先生的这一注释方法和抉择组织能力别具风格，也是他讲话、写作个性化的生动体现，特色鲜明。

其四，《史记笺证》的“集评”是韩兆琦先生对注疏体例的一种创新。传统的注解，着重字音字义、名物制度的训诂和年代与史事的考证，一般以疏解古籍的原文为限，主旨是疏通字义，读懂古文，这是一种微观的解读方法，无疑是注解的正宗，最基本的内容。“集评”则是超出字、句之外，在篇后评析，以一篇为一个整体单元，作宏观的义理解读，帮助读者欣赏古籍的价值，吸取思想营养，这是超越前人的一种创新。前文已指出，“集评”是荟萃前人的研究成果，沙里淘金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。读者通过“集评”，扩大了眼界，在有限的时间领略众多往哲时贤的风范，受益多多。“集评”之后是韩先生的按语，概述全篇主旨，评判传主，直抒胸臆，简洁明快，引领读者思考。有时对司马迁亦提出批评。例如《吕不韦列传》“集评”后按语说：“吕不韦自庄襄王元年为秦相，至始皇九年免职，前后为秦相十二年，而这段时间正是秦对东方诸国大举进攻，并逐步实现吞并的时代，而本文作为一个秦国宰相的列传，竟只字未提吕不韦对于秦国的政治有何建树，这就未免过于褊狭，过于失之公正了。”这个批评是中肯的。

此外，《史记笺证》在技术方面也有所创新。如对《史记》记载历史的地理、年代，《笺证》除了用现今地名、公元纪年加以对照外，特别加进了地图三十多幅，历史古迹、考古发掘、出土文物等图片一百三十多幅，使《史记》记载的历史内容形象化、视觉化，以利于读者的记忆和提高阅读兴趣；对古代的度量衡加注了当今的相

应值；对疑难字、生僻字加注了汉语拼音。这些细微地方的得当处理，拉近了古典作品与当今读者的距离，增强了时代感。加之《史记笺证》编著者整体行文的流畅与清新，使《史记笺证》有较强的可读性，具有雅俗共赏的功能。

《史记笺证》的成绩是巨大的，作者付出的辛劳也是巨大的。其间虽有些细枝末节似可再商，但它不伤《史记笺证》恢弘巨制之大雅，《史记笺证》不失为当今研究《史记》最具参考意义的重要著作。此书嘉惠士林，有益后学。是为之序，以示推荐云。

2004年11月28日于北京

张大可可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，当代史学家与《史记》研究专家，中国《史记》研究会副会长。

一 前 言

韩兆琦

从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汉起，到公元后 220 年汉献帝被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取代，前后共 427 年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汉代”。汉帝国的统一与强大是夏、商、周以来前所未有的，它与当时欧洲的古罗马东西并立，创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，并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汉帝国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，关键是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力经营。武帝是在他父亲平定吴、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打击、削弱国内的割据势力，同时反击北方匈奴族的入侵，并着手经营东南、南方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各方的边境，大大扩展了旧日华夏的版图，真正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友好相处的统一国家。这是一个宏阔豪迈、人才辈出、大有作为的时代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们似乎谁都想为国家建功立业，而且充满自豪地相信一定能获得成功。我们先看汉武帝的一篇《求贤诏》吧，他说：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驾之马，跃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，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。”这是何等的气度！班固曾在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里表述这个时代的人才之盛说：“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兒宽，笃行则石建、石庆，质直则汲黯、卜式，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，应对则严助、朱买

臣，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閤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，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，其余不可胜记。是以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。”为了与更远的其他国家进行交流，他多次派人通使西域，从而使中国文化变得更为绚丽多姿。鲁迅在《看镜有感》中说：“遥想汉人多少闲放，新来的动植物，即毫不拘忌，来充装饰的花纹……汉人的墓前石兽，多是羊，虎，天禄，辟邪……”“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，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毫不介怀。”汉武帝总结秦朝失败的教训，重视思想教化，大力兴办以儒术为中心，实则兼容并包以往各家各派思想理论的学术事业；他喜爱辞赋，搜采歌诗，加强中原理性文化与荆楚浪漫文化的融合，从而为汉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主、客观的良好条件。汉代最杰出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司马迁出现在汉武帝时代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省韩城市）人，生于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）。青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耕过田、放过牛，因为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，所以到二十岁时就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。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，前后十几年间，向南到过湖南、浙江，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、河南的许多地方。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，寻访文化遗迹，收集历史资料，向社会向劳动人民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。回到长安后不久，便入仕作了郎中。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。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，又正值武帝盛年，所以巡狩、祭祀一类的活动很多，因此司马迁能扈从汉武帝去过许多地方。元鼎六年（前110），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，在今云南、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，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进行过考察。这次他到过邛、笮、昆明等地，这是他的第二次大游历。

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，其父司马谈病在垂危。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《史记》，司

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。司马谈去世三年后,司马迁接替其父作了太史令。到太初元年(前104),撰写《史记》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。到天汉二年(前99),已经埋头于《史记》写作六年的司马迁,忽然大祸临头了。原因是这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,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。武帝让李广的孙子李陵为李广利运送物资,李陵不肯,自请率兵独当一面。经再三请求,武帝让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北行,以分匈奴兵势。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了匈奴大军。李陵与部下虽经英勇战斗,但终于因为没有后援,寡不敌众而失败。李陵也放下武器被匈奴人俘去。消息传来,满朝文武一变平时称道李陵的故态,纷纷落井下石,说李陵的坏话。司马迁深感不平。当武帝问到司马迁对此有何看法时,司马迁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,又说一支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相遇,打得如此卓绝,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。这使武帝大为震怒,他认为司马迁这是转弯抹角地攻击李广利,而且有对皇帝的不满,于是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。司马迁因为《史记》还没有写完,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,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。

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耻辱,是肉体上、精神上的一种极大摧残。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,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、生死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,这些在他的《报任安书》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白,在《史记》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。他说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”;他又说:“勇者不必死节,怯夫慕义,何处不勉焉”;他说:“诚已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忍辱发愤著书”,但这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。

司马迁受刑后,由于条件适合,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。中书令是个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小官,司马迁之所以要接受这个职务,正是由于这个职务可以更有机会接近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,而这些都是他写作《史记》所不能缺少的。就这样,他又忍辱奋斗了六